



杜受田故居

(上接B01版)

和平安定是

古丝路通畅的保障

唐朝的长安城,作为一个经济、文化繁荣的都市,更是各国商人经商、聚集的居留地。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朱雀大街街西的西市附近,以独特的经营方式,赢取丰厚的利润,成为长安社会中的一道风景线。在互通有无、赢取利润的过程中,他们也成为长安经济、文化繁荣的一个动力,使得长安“天下难得之货,咸悉在焉”。

“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,以及唐代以后不同国家的控制,古丝绸之路开始逐渐走出巅峰时期。”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孟楠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除了元朝时因辽阔疆域而短暂复兴,海上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步取代了陆路的位置。

而回顾古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,除了给中原及西域带来经济方面的繁荣,更给科技、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传播创造了条件。

“汉唐1000多年间,经过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技术和物产包括铸铁技术,凿井技术,种蚕和养蚕、纺织技术,纸张和造纸技术”,科技史学者易继明曾撰文指出,西方经古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技术和物产包括纹锦技术、玻璃烧造技术等。

“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活动与良性互动交流,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”冯培红说。

他认为,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,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基础。而由此带来的民族融合,又为丝路贸易走向巅峰创造了有利环境。而从这个角度来讲,古代比如今做的要更好。

“古代很多吸引外民族的措施比较得力,像北魏时期为西域各族设专门的接待机构,解决他们在中原地区生活的很多后顾之忧”,冯培红说,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,也需要我国展示更为开放的姿态。

“另外,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,发生战争的时候商品交易就少,和平时商品贸易就相对繁荣。”他补充到,确保经济带的安定,是丝路畅通的重要保障。

而对孟楠来说,古丝绸之路折射出的精神内涵,对如今的经济带建设更有示范作用。“丝绸之路是包容的,也是开放的。”他说,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和地区,在宗教、文化、制度和法律等诸多方面,都与我们有所不同。

“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本着一种包容的精神,是非常重要的。”孟楠说,“交流总是伴随着各种碰撞,这种碰撞可能会激发你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。”

“同时,它仍然需要一种开拓的精神。”孟楠表示,包括张骞、玄奘,他们都是凭着他们个人的毅力,对外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,也正是这种精神才带动古丝绸之路不断发展完善。

“当然,丝绸之路建设也需要一个政策支持,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,应该给这种贸易文化交流,提供更多的保障。”他认为,有时也需要国家和政府,刻意地采取措施,去维护像丝绸之路这样的发展和交流。

滨州杜氏父子五翰林,重教不重财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
朱洪蕾 王晓霜

身为朝廷重臣,却不置豪宅

初春的滨州,还是有些冷,在杜受田故居内,也有些冷清,只有三五个游客在游览。

杜受田故居在滨州城的北面而不是城中,这也许与滨州杜氏家族一贯的低调谦逊有关。

滨州杜氏家族中职位最高的是杜受田,他是清王朝咸丰皇帝的老师,死后获得了“文正”这一封建时代对臣子的最高谥号。在整个清代,也只有杜受田、曾国藩等八个人获得了这一谥号。

杜受田一生与父亲杜堉居住在一起,从来没有自己的房产,即便是官至尚书,协办大学士,还是与父亲同住一处寓所。

今日的杜受田故居实际上是他的父辈们留下的房产。故居始建于明朝中期,占地20余亩,是典型的明清鲁北建筑风格。

进入故居大门,正上方悬挂着“方伯第”、“相国第”、“传胪”、“会元”、“亚元”等牌匾,二门内还悬挂着一块“祖孙父子兄弟伯侄翰林”匾额。故居讲解员孙曼介绍,杜家四世六翰林,早已是滨州的佳话,而这些匾额只有进门后才能看到,可见杜家人的谦虚低调。

滨州市史志办年鉴科科长、地方文化研究专家侯玉杰介绍,杜受田故居的建筑低矮、狭窄、拥挤,这并不符合主人的身份。杜家大院的奠基人杜诗,位居二品,按照明朝礼制,他家的大门可以开三门,五架大梁,实际上杜宅仅一门;他居住的房屋可以有五间正房,九架大梁,但却只有三间五架梁。

滨州杜家历史上位高权重的官员很多,但他们的住宅都比较普通,房屋装饰十分简洁,大梁上一概没有绘画,雕刻少,线条也少。人道是“侯门深似海”,而这里既没有高墙大院,也没有亭台楼阁,和一般官宦人家相比都显得寒酸,远不足以彰显身份。

杜家人生活上很低调,为官却颇为积极进取,家族里几乎所有从政者都勤政爱民,清正廉洁。

明朝末年,官员贪腐成风,杜诗在主管湖北赋税期间,把原来收缴的无名杂税47万多两白银全部上缴国库,没截留一分钱,连崇祯皇帝都为之感动。



明洪武二年,杜氏家族一支从河北枣强迁至山东滨州。

经过了几代的沉寂之后,杜氏家族开始呈现出阖族竞秀的局面。明清两代,杜氏家族共走出进士12名,培养出以杜堉、杜受田等为首的父子五翰林。时人赞誉杜氏家族一门之盛,甲于天下,杜氏家族成为一方之翘楚。

清代道光二十一年(1841)初,杜受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,掌管起清王朝的钱袋子,可见道光皇帝对他极信任。当时,面对英国侵略者的赔款割地要求,捉襟见肘的三库急需一位既擅长理财又忠于国家的人,而杜受田堪当大用。他对大清银库的各种弊端早有耳闻,上任伊始,就采取强硬措施整顿库务。在查实了库员管库大臣舞弊后,立即将其革职查办,随后自己亲自监视收发,每日坐廊檐下查看银库出入,风雨无阻。从此,三库管理的漏洞得以弥补,开支节省,解除了皇帝的后顾之忧。

《述训》是一本家教秘籍

在明清两代,杜家六七百人为官,积累的物质财富却很少。滨州杜家宗亲会会长杜民生认为,先辈们个个都很清廉,这最值得后人学习。

杜氏迁居滨州的五百多年里,持续繁盛,这与其重视家学

传承关系密切。杜氏族人、滨州市培风书院院长杜建廷认为,滨州杜氏先祖非常本分、勤劳,第四代开始出秀才,之后更是出了举人、进士,再往后对教育就更加重视。

杜家人教育孩子要谦虚、低调、不张扬,同时保持上进心,把考取功名当作是必须要做的事,就连女孩子都被要求读书。

侯玉杰认为,杜氏教育一直讲究学业和道德并重。据他介绍,杜诗在如今的杜受田故居处曾开辟“净明山房”,供子弟藏书读书之用。为教育子弟,杜诗还把滨州西北的卧佛寺买下来,遍植松柏,办起家塾。

族人杜彤光在注重子女的早期教育中,首先进行德育,就连日常活动、游戏玩耍中,都要“要观其爱敬之良,不失赤子耳”,倡导“身教言教并重”,凡是教育孩子做到的,家长必须先要做到,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熏陶。

这些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,经过十几代人的积累、提炼和升华后,杜堉于道光七年(1827年)著成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——《述训》,成了杜家人沿用至今的教育子女的家族秘籍。

杜氏述训有8400余字,包括48条内容。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刘雪燕认为,《述训》的核心是修身,首先是长者要率先垂范,“教子以身不以言”;其次是“少年若天性,习惯成自然”,修身教育从小抓起,培养良好的习惯和风气;再次是年幼子弟犯错时必“怒责之”,“恐长自私自利之心而渐离其天性”。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家族成员的“知爱知敬”,避免“不美之行”,切实做到“修身之道,即教子也;教子之方,即齐家也”。

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杜立晖认为,杜氏述训包含的处世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例如,《述训》第一则中提到“自见之谓明,自听之谓聪,自胜之谓强。人惟不自见,自闻而后自是。既自是矣,长傲益怠,何有于强?乃所谓大愚也。”杜立晖解释,这旨在说明做人要充分认识自我了解自我,以避免陷入“自是”的境地,而骄傲、自满、懈怠等情绪的产生都是缘于没有充分自知。

杜立晖认为杜堉把此条放于文首,意在告诫子孙,处世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,充分认识、了解自己,戒骄戒躁,然后不断超越自我,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重视女子教育,拒绝缠足陋俗

杜家大院的男人们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杜家大院的女儿们也不甘落后,均非平庸之辈。

侯玉杰介绍,当地有“杜家女儿是老虎,媳妇是绵羊”的说法,大体是讲,杜家的女儿德才兼备,容貌传神,出嫁后,往往成为新家庭中的决策人物,而杜家大院娶进来的媳妇,都是名门大户的女儿,贤德淑良,往往以相夫教子为己任,成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。

在旧社会,女子要“三从四德”,凡是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,几乎都把女孩子圈养起来。而同样是大家族,滨州杜家的女儿们就幸福得多。如杜受田的女儿杜润宫,不仅可以在各个大院之间走动,还可以和他人一起学习。杜受田还把她带到北京,领略各地风光。

侯玉杰介绍,滨州杜家人认为,女儿是未来家庭的主事人,是母亲,因此,教育好女儿,关系着另外一个家庭的命运,杜家人甚至把女儿的教育看得比男孩更重要。

滨州杜家人还认为,女儿不像男孩那样可以长期带在身边随时教导,女儿一旦出嫁,父母鞭长莫及,所以,更要把女儿培养好,如果感觉女儿挑不起家庭的重担,宁肯带在身边晚一些出嫁。杜受田的父亲杜堉就著文论述过对女孩子的教育,他在《石画龕》中说:“世俗谓女为他家人,故多不教,此大惑也。惟其为他家人,尤不可不教,且视教子尤急焉。”

侯玉杰认为,正是由于杜家人特殊的教育女儿的思想,在杜家女儿身上出现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风尚。

杜家女儿不缠脚。中国女性缠脚的历史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已是根深蒂固,女子大脚是丑陋的标志,甚至找婆家都困难。然而,杜家大院的习惯却是姑娘不缠足。不仅如此,嫁到杜家的媳妇也要放脚。

杜家女儿精通读书画画。在封建时代,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女子基本被剥夺了读书的资格,以“女红”作为区分高下的技艺。杜家大院中的女孩子自小读书,琴棋书画和女工样样精通,有些还非常出名。不仅如此,嫁到杜家的媳妇也要读书。清朝末年,杜家大院中的女子还成了滨州第一批上学堂的女孩子。